

体育教师缺编 30万意味着什么

单士兵

今日论语

昨天,上海国际马拉松赛成功举办,为上海全民健身运动又添一把火。不过,前一阵子,各地相继发生多起大学生长跑意外猝死事件,让很多人思考,现在青少年体质到底怎么了?

有这样的数据,可以作为一个分析切入点——中国义务教育体育老师缺编30万。这个数字,是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日前披露的。与体育教师缺编30万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整体超编100多万。

体育教师缺编30万,到底意味着什么呢?

编制这个东西,在那些体制内

的公共领域,是很重要的。它不仅意味着福利保障,也不仅是一种管理工具,同时,更意味着相应的公共责任,关联着相关的配套资源。顺着这样的思维,来审视体育教师缺编30万,不难发现,这种缺编,在某种程度上表明,中国的体育教育缺乏科学性的运行,相关教育的权利与责任,也都陷入到一个模糊地带。

本来,按照2001年开始实施的新课程标准,体育课时是大幅增加的。在班级授课制教学模式下,要保证这些课时不被虚置,就必须相应增加体育教师,这是最基础的支撑。然而,体育教师缺编30万的现实,注定着体育课只能被应付、虚置、压缩、挤占、剥夺,结果就是学生相关受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,学校尽不到应有公共责任。

不重视体育课,主要源于两种严重错误的教育模式,一是圈养教育,一是应试教育。尽管学校都知道,保证中小學生“每天锻炼一小时”是责任义务,但是,有的学校扛着“安全教育”这面旗帜,对学生进行圈养化管理。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,很多学校教育理念可以说是“坐着不动最安全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哪里还能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呢?

再说应试教育。王登峰表示,现在有的学校,一个语文老师编制可以配三个语文老师,而三个体育老师编制都不一定配了一个体育老师。从中不难发现,体育教育已经何等边缘化。为什么会这样?道理很简单,在学校看来,学好“语数外”才是王道,因为这些科目是保证升学率提升,也就是保证教育政绩提升的

根本支撑,于是,体育随时都可能为这些科目让路。

而且,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些体育课,往往也都沦为“应试体育教育”,只知道围绕着50米跑、800米跑、跳远、仰卧起坐、引体向上、实心球等考试科目进行,为达标服务,根本不注重培养学生喜欢运动的习惯,不懂得培育学生的运动文化,学生又怎么可能让运动成为一种价值取向,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呢?

没有合格的体育教师,哪来科学的体育教育,又怎么可能培养身体健康和意志品质都过硬的一代?体育教师缺编30万,是一种公共责任的严重缺失。悲哀的是,对这种公然损害教育权利,不履行公共责任的现象,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的责任追究和问责措施,这恐怕同样值得深思。

新民随笔 大怪路子

晏秋秋

朋友捧场,给末上门的“毛脚”带话:初次上门时,寻两个朋友来,我再找两个老搭子,打大怪路子。

朋友拿过上海市大怪路子比赛的第一名。他说,大怪路子见性情。有没有大怪,没关系,对不对路子,很关键。

在扑克类游戏中,大怪路子是比较复杂的。而且,大怪路子是三对三,配合比牌更重要。配合得好,烂牌照样逃生。配合得不好,好牌同样憋屈。朋友说,“做人也是一样的!”

打大怪路子,有很多素质要求。要有洞察力。同伴最多打两手牌,基本牌型就能判断。大局观很重要。

要有牺牲精神。为了跑头家,“一家一当”也要上,哪怕自己被关。

要不屈不挠。打残局时,不管手中牌多差,都不能失去信心,寻找每一次机会脱身。朋友说,大怪路子的最高境界,不是好牌跑头家,而是烂牌拿到倒数第二家。

要学会信任。一般来说,三个人配合,总有一套基本规则。不按牌理出牌,骗了对手,同时也会骗了搭档。不按牌理,一两副牌可能获益,时间长了就得不偿失。

要精准记忆。记不清牌是大怪路子的天忌。朋友说,比赛时曾见一人,牌记到10,最终一张10带两个6,直接丢出来。“这是水平,知道10是最大的牌。”

要善于总结。大怪路子和装修一样,是缺憾的艺术。每一副牌打完,哪怕抓了三家,总还有值得总结的地方。“不复牌,就绝对不会提高。”

千条万条,归根到底,朋友说,打牌要认真。“我最见不得打牌不认真的人。常听人说,打牌是消遣,何必那么认真。和这样的人,我是不打大怪路子的。既然做一件事,就要做好,否则永远没进步。”

朋友还有“牌友”,都是当年大怪路子比赛时认识的。其中有身家几十亿的老板,有下岗工人,但一起聊牌谁也不服谁。开头常是:“第一届上海大怪路子比赛半决赛时,你打错一副牌……”一顿饭能吃五六个小时。他们聊牌局,不用扑克牌,全都记在脑子里,真有点围棋中“盲棋”的味道。

最近一段时间,电视上有了大怪路子比赛。朋友说,讲解得不好。“六家牌都看明白,还能出这么多错,真不应该。”我说,要求就不要太高了。让更多的人喜欢大怪路子,这也是全民健身的一种。朋友幽默地叹一句:“高手越来越少了。”

媒体视点

人民日报《网络反腐须纳入法治轨道》:争论网络反腐利弊的同时,更不能忽视这样的诘问:如果正常的投诉渠道畅通有效,网络举报何以如此盛行?而反观网络反腐显而易见的短板,更提醒我们当前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,是多么地必要和紧迫。(苏显龙)

济南日报《别放大“研究生开出租车还贷”的悲情》:成熟的舆论,不仅要善于从一些事件中探究社会的共性问题,更要保持相当的认知理性,懂得平静地就事论事。(赵勇)

新京报《城市屋檐下再现智障民工,谁之过?》:随着涉案人员被抓、被困人员获救,这一事件似乎已经结束,但是,关于智障人士权利保障的问题并未消失,还将继续拷问着这个社会。织就一张覆盖全社会、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之网,也变得愈来愈迫切。(胡印斌)

消除“艾滋歧视”是社会共同的责任

新民网论

2008年,老夏被确诊感染HIV病毒,2011年他参与纪录片《在一起》的拍摄,并自愿去除遮挡,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大家了解艾滋病。老夏说,感染艾滋病是隐私,他敢于站出来直面公众,是想改变由无知引起的歧视。而现在,却让“自己的生活道路越走越窄”。

12月1日是第25个“世界艾滋病日”,但毋庸讳言,当下社会对艾滋病还有很多误解,对艾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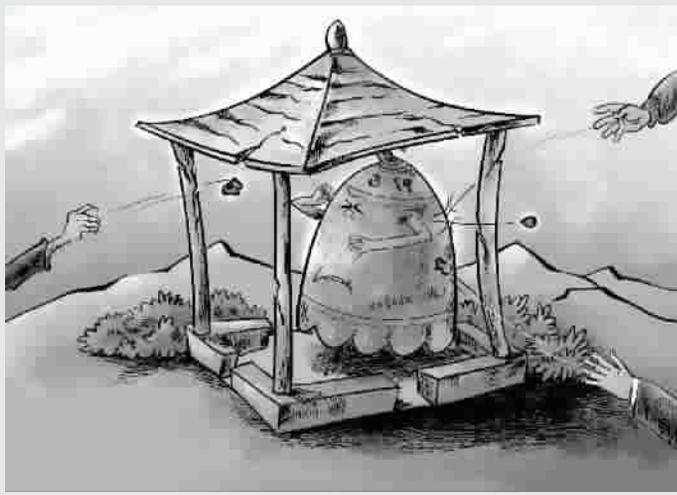
患者更是有许多歧视,老夏的遭遇并非孤例。来自社会的歧视与误解,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来说,是比疾病本身更为痛苦的事。

无所不在的“艾滋歧视”,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恶性循环。很多人不是不愿意接触或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,但因担心其他人不理解,使自己和家人受到排斥,只能随大流。如果只是个别志愿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、艾滋病病人自发进行的艾滋病知识宣传,效果并不会太理想。

要消除社会对艾滋病的误解

和歧视,就需要加大宣传、教育、行动力度。专业人士更应该积极参与艾滋病知识传播,带头破除艾滋歧视。若医务人员能够正确认识艾滋病,消除不必要的恐惧,为感染者(患者)提供平等的服务,也就能避免引起外界错误解读。各级政府也要带好个头,化解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。学校应结合中小学性教育,向青少年宣传预防艾滋病、性病知识,保护青少年免受艾滋病、性病危害的同时,让他们正确认识艾滋病。

(新民网评论员,网址www.xinmin.cn)



乱石敲钟谁来护?

苍龙山上古钟鸣,叮当作响诉哀情。游人乱石博一笑,不是山阳敲钟人。陝西南洛市山阳县政府大院后面的苍龙山上有一座八角亭,亭中挂着一口明朝古钟,铭文记录了山阳县的历史沿革,世人称为“铁县志”,但由于缺乏保护,如今该钟被游客乱石砸得遍体鳞伤。孺子牛画

观点圆桌

泥瓦工工资高了还是低了?

新闻焦点:据潇湘晨报报道,近日网传一份民工工资表,显示泥瓦工日工资为220元,最高日工资是队长的350元。这份表格引发热议,有人说,“真心不是滋味。”但更多人认为,这是血汗钱、辛苦钱。

该拿这个数

“蓝领”并不意味着低收入,我们现在的装修工收入的确比以前有所提高,但也只是他们劳动价值的逐渐回归。

刘昌海

其实不算高

泥瓦工是短期的雇佣工,收入是裸工资,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劳动保障待遇。而他们每天却要工作11个小时以上,这点工资并不算很高。

许斌

有需求才有市场

劳动者的报酬不取决于身份和职业,而是市场的需求。劳动力本身也是商品,唯有从商品和市场的角度看待问题,才会对泥瓦工月薪进行理性解读。

堂吉伟德

网视舆情

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张兰加入外籍,近日引发舆论热烈讨论。过去,人们潜移默化地有种观念,即政协委员作为参政者,其前提必须是本国国民,这种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,与当下人们对民族国家概念的认知有关。唯有本国国民,他才有管理国家的资格,这种身份不仅将塑造政治的合法性,更重要的是,在很多人看来,它也是一种忠诚、爱国的表现。

这种逻辑在网络中普遍存在,它不仅作用于体制内,在体制外也有较大的市场。网络中的批评者,他们对社会问题发表见解,批评体制的种种不足,与此同时,他们又经常会表达一种建设性的动机,提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推动国家的进步,尤其重申自己不会移民。这是因为在多数网民看来,他们的

今年网络舆情的三种现象

何小手

批评如果没有本国国民身份做保障,他的爱国态度以及推动国家进步的动机,往往就该受到怀疑。

网上对张兰们的调侃一直存在,并由此上纲上线。早先,知名度较高的人,比如张海迪,网民对其国籍的猜想可谓五花八门,各种传闻不胫而走。此次张兰移民后,张海迪又特意答人民日报问,提示“这里是我的祖国”,类似的表示已出现多次。

张兰移民引发网民的人肉热情,@新华社中国网事在其微博发动网友调查外籍政协委员。网友的热情,不仅是出于一种制度洁癖,更重要的是在于,当下中国富裕阶层的移民倾向较为明显,由此导致网民对富裕阶层的参政者往往心存芥

蒂。从这个角度看,后者若想继续参政议政,不移民的确是必要的前提。

临近年终,各种总结纷至沓来,这一年网络舆情也出现诸多新的变化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负责人在一次新闻界的研讨会上总结,称2012年网络舆情有三种新现象较为明显,即草根“反日”、知识界“站队”、媒体“国进民退”。钓鱼岛纷争期间,草根反对日本政客右倾倾向在网上网下都有着积极表现,纵观整个过程,不难发现,维护国家主权是普通民众的共同主张,人们愿意通过实际行动表达爱国热情,与此同时,还要注意到,无论是网络的意见表达,还是线下的行动,爱国行为背后还夹杂着各种复杂的情绪,其中既有对社会的不满,也有来自个人对生活的愤懑。

知识界的“站队”一度引发一些人的忧虑,尤其是个人的线下约架,这种简单粗暴的对峙集中体现了舆论生态的暴戾倾向。约架双方无所谓输赢,就其在网络中的角色而言,他们充其量都是一些无力者。让无力者前行,倾听沉默的声音,这些至今回响在互联网的声音,其背后的诉求值得正视。至于媒体“国进民退”,人们乐于见到中央媒体接地气,但在传统媒体生存每况愈下的情况下,市场化媒体曾经赖以生存的经营法则日渐受到约束。作为一种媒体介质,人们相信传统媒体短时间内不会退出舞台,但这种信心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它们的社会作用,而非市场号召力。(作者系人民网舆情观察室特约舆情分析师)